

HISTORY OF SINO-US RELATIONS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中美关系
研究丛书

汪 照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美关系史论丛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中美关系研究丛书

汪熙 主编

中美关系史論丛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美关系史论丛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08 千字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75

1985 年 10 月第一版 1985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书号：11253·015 定价：2.85 元

前　　言

这本集子收入了自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中美关系史的论文15篇。这些论文涉及到中美关系史的一些方面，但并不是所有的方面。这是因为：一者，有些问题我国学术界还尚未进行较深入的研讨，有待于进一步开拓；再者，有些问题目前还正在争论中，意见纷呈，还没有一个较完整的论述，有待于进一步展开。后面这一类有争论的问题将来可以编成专辑，也许更有利于学术上的研讨。还有一些很好的论文，由于篇幅有限，不可能一次收全，我们将继续编辑论丛，有了篇幅，就可以收得更全一些了。

收入这本集子的文章，多数是已经发表过的，有几篇是尚未发表过的。对已经发表过的文章，有的作者因近几年来国内外档案材料有了新的发现，在收入这本集子时，又作了较大的补充和修改，以便吸收新的材料和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各篇论文（包括序言）只代表作者的见解，编者除要求注释详明并作了一些技术性的处理以外，对内容概不增删。

在美国排华运动的研究方面，我们一直在找寻一篇分析历次排华法案形成过程中美国国内各种政治影响因素的论文。今年访美时，梅缵月博士推荐许佩娟（Shirley Hune）教授的一篇论文，有点近似我们的要求。承作者同意收入本集，我们表示感谢。本集主要是收集国内学者的论文，这一篇算是例外。

这本集子里各篇论文的作者，有的是多年从事这一问题研究的老专家；有的是春秋正富的中年学者；有的是“初出茅庐”的青年研究生，它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这门学科也正在形成三个梯

队，反映了在党的正确方针引导下，学术繁荣的可喜景象。

王邦宪、邹明德同志协助了这本集子的编辑工作。

我们的水平有限，编集这一学科的论集还是一个尝试，诚意地欢迎读者批评和建议，以期能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两百年前的今天，正是“中国皇后号”由纽约驶抵广州的日子。我们谨以这本集子作为中美交往两百周年的一个纪念吧。

汪 熙

1984年8月28日于复旦校园

目 录

回顾和前瞻(代序).....	汪 熙 王邦宪	1
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罗荣渠	10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和介绍.....	陈胜森	31
鸦片战争前的中美贸易.....	汪 熙 邹明德	93
华尔，白齐文研究.....	项立岭	147
美国传教士与太平天国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邹明德	167
丁韪良和京师同文馆.....	王维俭	194
十九世纪后期中国人在美国开发中的作用和处境.....	朱杰勤	230
1876—1882美国制订排华法案过程中立法与 行政的冲突.....	[美]许佩娟	260
马克·吐温、美国传教士与义和团.....	顾长声	285
美日在东北的一场激烈争夺.....	余 伟	298
✓略论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	易显石	315
论太平洋战争前美国远东战略及其演变.....	王斯德 李巨廉	328
论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王邦宪	349
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	周洪钧	377

Series Publication of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Th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elected Essays**
Edited by Wang Xi

CONTENTS

<i>Forward</i>	(1)
1.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the Establish- ment of the New China	
<i>Wang Xi Wang Bangxian</i>	(1)
2. Some Questions Regarding Research o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American History	
<i>Luo Rongqu</i>	(10)
3.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ese Eyes Before and After the Opium War	
<i>Chen Shenglin</i>	(31)
4. Sino-American Trade Before the Opium War	
<i>Wang xi Zhou Mingde</i>	(93)
5. On Frederic T. Ward and Henry A. Burgevine	
<i>Xiang Liling</i>	(147)

6. American Missionaries and American China Policy During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Zhou Mingde..... (167)
7. W. A. P. Martin and the Tung Wen Kuan in Peking
Wang Weijian..... (194)
8. The Status and Role of Chine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th Century
Zhu Jieqin..... (230)
9.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xclusion: Legislative-Executive Conflict, 1876-1882
Shirley Hune..... (260)
10. Mark Twain, the American Missionaries and the Boxer Uprising
Gu Changsheng..... (285)
11.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Scramble for Manchuria
Yu Wei..... (298)
12. 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American Attitude to the September Eighteenth Incident of 1931
Yi Xianshi..... (315)
13. The American Far East Strategy Prior to the Pacific War
Wang Side Li Julian..... (328)
14.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uring the Pacific War
Wang Bangxian (349)
15. Edgar Snow and His "Red Star Over China"
Zhou Hongjun..... (377)

回顾和前瞻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代序)

一、两个阶段的发展

解放以来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1949—1979年为第一阶段；1979—现在为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79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是在中美两国之间激烈对抗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的，到1979年的三十年中(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这一领域的研究基本停顿。实际上只有二十年不到的时间)共出版了20多部专著和小册子，发表了论文和文章220多篇。这与解放前将近五十年(1901—1949年)中文章不过300多篇，专著更少的情况相比，应该说成就是很突出的。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有以下的一些特点：

第一，对中美关系史进行了较全面的回顾。从纵剖面看，自广州一口通商时期的鸦片贸易一直到1950年美国入侵朝鲜，几乎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所论述；从横断面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宗教和人物等各个领域都涉及到了。近百年来有关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还从来没有把问题铺得这么广阔，把时间串得这么紧密，可以说揭开了我国同美国关系史研究的新一页。

第二，对美国侵略的一面有较深刻的揭露。解放以前，由于

资产阶级的学术传统的束缚和反动政府对美国的依附地位，在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中，对美国侵略活动的揭露，存在着思想上和实际上的障碍。解放后，美国对新中国采取的一系列敌对行动和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地位，为中国历史学家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准备了条件，因此能比较彻底地揭露美国的侵略活动。特别是对历来隐藏在“善意”、“宗教”、“文化”、“援助”面纱下的侵略活动作了很有力的揭露，不仅使中美关系的不同侧面有了较完整的反映，而且也帮助其他国家的人民澄清了在这些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其影响是具有国际性的。

第三，开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剖析中美关系史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历史学家中掀起了一个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潮，通过学习，思想境界开阔了，目光更敏锐了，开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原理为武器，对中美关系史的各个方面进行剖析和再评价，使这一门学科的研究，无论是在方法论上或在问题分析的科学性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第四，初步建立了中美关系史的框架与结构。在这一阶段出了几本有关中美关系史的书，虽然都是从美国侵略的角度进行论述的，但是作为建立这一学科的体系来看，毕竟提出了初步的结构与框架（如分期问题；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问题；具体结构的安排问题等），这就为今后这一学科的建设提供了初步的基础。

当然，这一阶段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由于这一学科的研究是在当时中美双方处于敌对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实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十分密切，研究的题目几乎无一例外的集中在美国的侵略活动这一方面。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完全必要的，但对非侵略活动与交往历史的研究，就几乎是一个空白。其次，同其他的学术领域一样，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也受到“左”的思潮的干扰，因而在不同程度上带来了片面性，影响了它的科学性。再次，由于受到档案材料和第一手资料不充分的限制，对中

美关系史中一些历史过程还没有弄清楚，评论也不够全面。即使是对美国侵略活动的揭露也还不够充分（例如美国在历史上对中国采取的军事活动或准军事活动，都还没有系统地研究过）。

第二阶段：1979—现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正确的方针路线指导下，中美关系史研究又有了恢复与发展。这一阶段仅五年时间，就发表了60余篇论文。这些论文，思想开阔，选题多样，论点新颖；特别是对某些问题初步展开了学术性的争鸣。在已发表的论文中，新课题的研究占了一半；用新资料来重新研究旧课题的又占了一半。可以说进一步全面考察中美关系的历史是这一阶段的中美关系史研究的一个主要特点。因此，把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第一，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中美两国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关系中，“有过友好的相处和交往，也有过相互对抗和冲突”⁽¹⁾。如果说在第一阶段的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比较集中在“对抗和冲突”的话，那末这一阶段的研究，开始注意到较完整地理解中美关系的两个方面，并对“友好相处和交往”也有所探讨。同上一阶段不同，历史学家不但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美问题，而且从世界的角度、从地域政治的角度来看中美关系；有的学者还从美国内部的政治与经济的结构变化与利益集团的消长来看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这样，就把中美关系史放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来考察，这无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有助于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中美之间的历史关系。

第二，新档案材料的公布与国际学术交流推动了这个学科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国家档案有一部分已超过了保密期限，逐步对外界开放。迄今为止，学者已可利用五十年代的美国国家档案。中国档案也部分对外开放。这样就为历史学家提供了

更广阔的历史基础，并使他们有条件探索一些新的课题，如抗日战争时期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史迪威问题；国民党崩溃前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形成与决策问题。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也为中美之间学术交流创造了条件。两国学者之间相互的研讨与启发，打开了各自的眼界，这比学术上的“闭关自守”显然更有助于推动这一学科的发展。

第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方针，赋予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以新的生命力。在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中，也初步出现了不同观点的争鸣，只要这一势头健康地保持下去，使不同的观点都能各抒所见，在讨论与争鸣中取长补短，存是去非，中美关系史这一门学科研究，必能达到更高的水平。

这一阶段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虽有较显著的发展，但也有不足之处，首先是我国的档案资料工作进展缓慢。我国藏有丰富的对外关系档案，但编纂整理工作至今还没有提上日程。历史学家既不应该以史代论，也不应该以论代史。但是史与论的结合必须以历史的事实（特别是第一手的史料）为基础，档案资料问题长期没有解决，限制了这一学科的发展。其次是课题研究的发展不够平衡。这一阶段研究注意到了中美之间还有友好合作的一面，并在这个课题上取得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这是对的，今后还应注意这一方面的研究。但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历来就有“是敌人一切都否定，是朋友一切都肯定”的绝对化倾向。其实历史是复杂的，友好与对抗的关系，在现实的历史中是相互联结、相互交织、相互破坏的。历史学家的任务正是要把它们综合起来进行考察，片面性与科学性总是不相容的。在这一阶段中，研究工作者注意到友好交往的一面，但对抗一面的研究显得不够。例如美国对华政策，强权政治是他的一个特点。执行侵略政策的美国当局，往往推说是在贯彻议会的决议（其实是利益集团的利益），好象理所当然地应该把美国的意志强加于人。这也许是美国的

“议会民主”，但对其他的国家来讲，则是道道地地的强权政治。美国1888年的史葛特排华案，1934的白银法案，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都是在这一套逻辑下，一脉相承的强权政治。这种对外政策的“美国传统”，一再激起中美关系的对抗，但迄今我们还没有对这一类问题作系统的研究。从部门方面看，研究课题也有些不平衡，关于中美经济关系的论述就比较薄弱。例如，我们还没有看到详细论述鸦片战争后中美贸易的研究成果。而这个课题在中美关系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并且具有很多特点。再次，中美关系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过程，有许多事实需要进一步弄清，有些问题应该给予新的评价，有的揭露还应该深刻化，这都要在独立研究与相互讨论中发展。事情弄得越清楚，问题讨论得越彻底，侵略揭露得越深刻，就越有利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并作为今天制定政策的参考。这样做是符合科学性，也符合国家利益的。但这就要求我们以同志式的平等的地位，采取以理服人态度开展学术讨论，而不能与此相反。我们希望有影响的学术机构和有影响的学者在树立良好的学风方面起一个带头作用。

二、几点设想

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虽已有很大的发展，但无论是从广度和深度来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问题的探讨，资料的编纂，人才的培养等等。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提出来就教于同志们。

(一) 要应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研究中美关系史。这包括三层意思：第一，要研究矛盾的两个方面。研究中美关系史，不仅要研究中国的一方，也要研究美国的一方，不仅要研究美国对华政策使中国受害的情况，还要研究它的对华政策是怎么形成的——它的经济结构、政治集团、舆论动向和人物素质等在形成对华政策

中的作用和影响。因此，研究中美关系史的人，除了熟悉中国历史中外，还应该熟悉美国的历史。把矛盾的两方面都搞清楚，才能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从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第二，要了解矛盾诸方面，相互联结的关系。同中美关系这一对矛盾相联结的还有许多其它的矛盾。它们常常会对中美关系这一对矛盾起影响，有时甚至起主要的作用。中美关系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双边关系，它常常受其它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的影响。因此，研究历史上的中美关系，必须考虑世界的格局及列强在中国的格局。特别重要的是要探究英、日、俄、美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势力消长与它们之间的纵横捭阖的矛盾。只注意中美之间的矛盾而忽视了与这对矛盾相联结的其他诸矛盾及其相互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是不可能把中美关系研究透彻的。第三，要研究矛盾的转化。事物在不断地发展，矛盾的组合关系和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起伏升降也在不断转化。历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透过现象来剖析与历史事件相关联的公开和潜在的矛盾转化，对历史事件的发展与变化作出合理的解释。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假使罗斯福总统不在任期内逝世的话，后来的中美关系将不会急转恶化。这种看法就可能忽视了矛盾转化的因素。抗日战争时期，罗斯福总统采取了接近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甚至派遣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这一切都是当时一个压倒一切的主要矛盾——美国与日本生死决战——所支配的。当德国投降，日本已成困兽，胜负之局已定的时候，这一主要矛盾逐渐从地平线上消失；另一个主要矛盾——美国称霸世界，扩张资本帝国主义势力与反对或阻碍这种称霸与扩张的矛盾——就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地位了。矛盾已经转化，美国的政策与策略作了相应的调整，终于拉下了面纱直接参加与国民党政府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为在亚洲一个广阔而关键性的地域，出现一个赤色的中国，是美国当权派所忍受不了的。我们相信，即使罗斯福总统不在任期内去世，也会同

样地执行后来杜鲁门所执行的扶蒋反共政策的。不承认矛盾的转化，认为事物总是一成不变，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并不存在。

(二) 要过细地分析中美关系中各种矛盾的性质及其影响。在帝国主义时代，一个最先进的、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并享有不平等条约特权的美国，与一个落后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非常脆弱的中国之间的关系，除了是一个帝国主义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外，难道还可能有其它的关系吗？问题是在这个侵略与被侵略的大前提下，中美之间的接触会带来相互影响的许多因素，从而产生很多的矛盾。例如：用武力迫使中国打开大门接触世界与妄自尊大、闭关自守的矛盾；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德”先生、“赛”先生的输入与中国反动政府专制与愚民政策的矛盾，等等。这样分析矛盾不是为帝国主义侵略开脱罪行吗？非也。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华民族遭受到沉重的灾难，这个罪行是客观事实，谁也否认不了。但是事物矛盾的本身是错综复杂的。这些矛盾确实伴随侵略俱来，并且是为侵略服务的，但是它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影响，促进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发生变化，促使中国在精神和物质上都产生了帝国主义侵略的对立物。马克思曾指出：“英国侵略印度，给印度带来沉重的灾难，但又在印度的社会革命中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²⁾；毛泽东同志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只是要使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但又“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³⁾，这样的科学分析并没有开脱西方侵略者的罪行；相反，却更有助于认识侵略者的破坏性。直到1949年以前，在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百多年来，中国“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⁴⁾。漫漫长夜，中国的旧世界是怎么失去的，新世界又怎么迟迟不来？为什么在文化传统同我国基本相似的日本，也受西方的侵略，也搞闭关自守，但后来发奋振

兴，而旧中国却成了另外一个模样？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我们应该象马克思所教育的那样，在科学的分析中要超越那些使我们“感到悲伤”的“感情”进行冷静的探索⁽⁵⁾。既要理所当然地、理直气壮地揭露、谴责美国的侵略活动，也要对与此俱来的一些矛盾进行具体的、过细的分析，这才能更深刻地揭露，也才能更深刻地认识自己，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奋发图强。不愿意或回避探究这些问题，并不是科学的态度。

（三）我国是一个有优秀文化传统的国家，典籍的丰富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但是近代外交关系史档案的编纂出版工作进展比较缓慢，以致于现在研究中美关系史（特别是清季以后的）主要还得依靠美国的公私档案，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应该及早结束。当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对外档案是全部公开的，但不能以此为借口不去做我们应该做而且完全能够做的事情。我们建议有关部门应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按国别地编纂出版一批档案资料。国家在作出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规划时，首先应考虑组织各方力量把编纂出版档案资料作为第一步。我们遗憾地看到国家关于这一学科的社科规划并没有反映这一愿望和要求。

（四）加强培养人才的工作，展开学术争鸣。由于种种原因，中美关系史历来是一个“禁区”，老一辈的只是兼搞一下，新一代的也不愿涉足这个“是非之地”。对比一下，美国方面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的涌现与人才辈出的情况，我们应该有一个紧迫感。“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⁶⁾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些高等学校已开设了有关中美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的课程，并正在培养这一专业方面的研究生。这就为这一学科的发展准备了人才条件。

任何学术的发展，都必须在讨论与争鸣中前进，而任何一个认真的科学的研究者，都欢迎学术上的争论，那怕是尖锐一点也是

欢迎的。通过争鸣，可能会使一个研究工作者获得一个长期搜求不到的资料；或打开一条苦苦思索的思路；或补充一个片面的判断；等等。这些收获常常会使一个研究工作者更接近真理一步，其乐无穷。健康的讨论与争鸣总是促进学科向前发展而不是相反。我们应该打破中美关系史是一个“禁区”的这个“传统”，鼓励更多的人（特别是中青年学者）来投身于这一学科的研究，产生更多的高水平的成果，这才是一代新中国繁荣之道。

汪熙 王邦宪

（此文原载《复旦学报》1984年第5期）

注 释

- (1) 1984年1月10日赵紫阳总理访问美国，在里根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上的讲话。
（载1984年1月12日《人民日报》第4版）。
- (2)(5) 马克思：《大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50页。
- (3) 毛东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载《毛泽东选集》1966年横版本第2卷，第589页。
- (4) 马克思：《大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46页。
- (6)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167页。